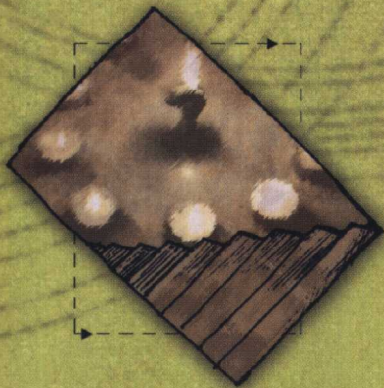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诗歌史

ZHONGGUO DANGDAI SHIGESHI

程光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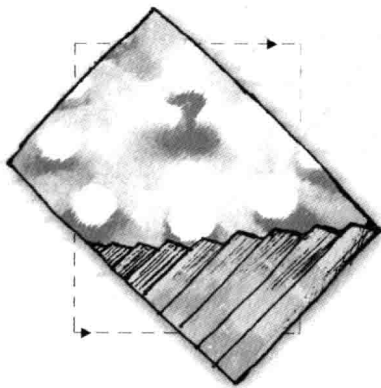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诗歌史

ZHONGGUO DANGDAI SHIGESHI

程光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7-300-04714-9/G·978

- I. 中…
- II. 程…
- III. 诗歌史-中国-当代-教材
-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0977 号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诗歌史

程光炜 著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239 (出版部) |
| | 010-62515351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密兴印刷厂 | | |
| 开 本 | 787×965 毫米 1/16 | 版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26.5 插页 1 | 印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483 000 | 定 价 |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通识教育，有人称素质教育，也有人称博雅教育。无论如何称呼，其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不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康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除了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目前，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都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部的倡导下，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通识课程。但是，课程不够系统，教材缺乏适用性，甚至没有教材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利于通识教育广泛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校开设通识课程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出版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为我国的人才培养服务，为高等教育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上篇 50—70 年代的诗歌

| | |
|---------------------------|------|
| 第一章 当代诗歌的萌生 | (3) |
| 第一节 战时文化的渗透和延续..... | (3) |
| 第二节 诗界的分裂..... | (9) |
| 第三节 体制的初创 | (16) |
| 基本概念 | (25) |
| 复习思考题 | (25) |
| 参考书目 | (25) |
| 第二章 老诗人的不同命运 | (26) |
| 第一节 郭沫若等人的姿态 | (27) |
| 第二节 “40 年代”和“两个诗群” | (36) |
| 第三节 艾青、田间的“尴尬” | (43) |
| 第四节 “身份”的重新界定 | (53) |
| 第五节 延安诗人的新表现 | (63) |

| | |
|-------------------------------|--------------|
| 基本概念 | (73) |
| 复习思考题 | (74) |
| 参考书目 | (74) |
| 第三章 青年诗界的“崛起” | (75) |
| 第一节 南下、北上及其他 | (75) |
| 第二节 军旅诗的“美学陌生化” | (78) |
| 第三节 西南边陲诗的异地想象 | (84) |
| 第四节 “生活诗”的出现 | (92) |
| 第五节 少数民族诗人 | (103) |
| 基本概念 | (108) |
| 复习思考题 | (109) |
| 参考书目 | (109) |
| 第四章 “大跃进民歌”的狂飙突进 | (110) |
| 第一节 1958年的含义 | (110) |
| 第二节 新诗争论中的文人气质 | (119) |
| 基本概念 | (127) |
| 复习思考题 | (127) |
| 参考书目 | (127) |
| 第五章 激进诗歌的涌现 | (128) |
| 第一节 温和与激烈的两种思潮 | (128) |
| 第二节 政治抒情诗的复杂形态 | (131) |
| 第三节 反帝题材与新农村构想 | (144) |
| 基本概念 | (149) |
| 复习思考题 | (150) |
| 参考书目 | (150)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诗坛内外 | (151) |
| 第一节 背景与成因 | (151) |
| 第二节 红卫兵、小靳庄和报刊诗歌 | (155) |
| 第三节 沙龙、“手抄本”与其他 | (159) |

| | |
|----------------|-------|
| 第四节 天安门诗歌····· | (164) |
| 基本概念····· | (169) |
| 复习思考题····· | (169) |
| 参考书目····· | (170) |

中篇 80年代的诗歌

| | |
|-----------------------------|-------|
| 第七章 多元杂陈的80年代 ····· | (173) |
| 第一节 不安的诗坛····· | (173) |
| 第二节 困惑与寻找····· | (179) |
| 第三节 招致批判的“三个崛起论”····· | (188) |
| 基本概念····· | (196) |
| 复习思考题····· | (196) |
| 参考书目····· | (197) |
| 第八章 引人注目的“问题”诗 ····· | (198) |
| 第一节 政治抒情诗的“广场效应”····· | (198) |
| 第二节 “不满”诗····· | (206) |
| 基本概念····· | (209) |
| 复习思考题····· | (209) |
| 参考书目····· | (209) |
| 第九章 从历史风暴中“归来” ····· | (210) |
| 第一节 艾青的“复出”····· | (210) |
| 第二节 创伤与申诉基调的确立····· | (216) |
| 第三节 “七月”诗人的写作····· | (226) |
| 第四节 “九叶”诗人的寻求····· | (233) |
| 第五节 其他诗人····· | (239) |
| 基本概念····· | (242) |
| 复习思考题····· | (242) |
| 参考书目····· | (242) |
| 第十章 朦胧诗的出现 ····· | (244) |
| 第一节 食指的意义····· | (244) |

| | | |
|-------------|-------------------|-------|
| 第二节 | 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杂志 | (250) |
| 第三节 | 北岛的诗 | (257) |
| 第四节 | 其他主要诗人 | (261) |
| | 基本概念 | (272) |
| | 复习思考题 | (272) |
| | 参考书目 | (272) |
| 第十一章 | 诗歌批评和新诗史研究 | (273) |
| 第一节 | 谢冕等的批评活动 | (273) |
| 第二节 | 新诗史研究状况 | (281) |
| | 基本概念 | (285) |
| | 复习思考题 | (285) |
| | 参考书目 | (286) |
| 第十二章 | “新锐”迭出的诗坛 | (287) |
| 第一节 | 断裂姿态和先锋趣味 | (287) |
| 第二节 | “他们”的“口语”诗 | (296) |
| 第三节 | “非非”的实验 | (302) |
| 第四节 | 北大诗歌及其他 | (307) |
| 第五节 | 女诗人的表现 | (313) |
| | 基本概念 | (318) |
| | 复习思考题 | (319) |
| | 参考书目 | (319) |
| 第十三章 | 西部诗和乡土诗 | (320) |
| 第一节 | 昌耀等诗人的寂寞 | (320) |
| 第二节 | 边地、异乡的青春诗篇 | (324) |
| 第三节 | 特色各异的乡土诗 | (331) |
| | 基本概念 | (335) |
| | 复习思考题 | (335) |
| | 参考书目 | (335) |

下篇 90年代的诗歌

| | |
|---------------------------------|-------|
| 第十四章 90年代诗歌略述 | (339) |
| 第一节 基本形态和特征 | (339) |
| 第二节 趋向“复杂”和“综合”的诗歌理念 | (343) |
| 第三节 演进中的几个阶段 | (349) |
| 第四节 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 | (352) |
| 基本概念 | (357) |
| 复习思考题 | (357) |
| 参考书目 | (358) |
| 第十五章 历程：从80年代到90年代 | (359) |
| 第一节 进入历史的方式 | (359) |
| 第二节 本时期的创作之一 | (364) |
| 第三节 本时期的创作之二 | (369) |
| 基本概念 | (373) |
| 复习思考题 | (374) |
| 参考书目 | (374) |
| 第十六章 其他诗歌现象 | (375) |
| 第一节 诗歌民刊状况 | (375) |
| 第二节 其他诗人和海外流寓诗人 | (378) |
| 基本概念 | (384) |
| 复习思考题 | (384) |
| 参考书目 | (384) |
| 中国当代诗歌年表 | (385) |

上 篇

50—70 年代的诗歌

MAR 24/01



第一章

当代诗歌的萌生

在 1949 年到 1976 年间，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21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它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一调整中歌唱与礼赞的使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没有如此的密切过，文学也从没有如此得心应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

第一节 战时文化的渗透和延续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诗歌的第一页，是与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一道揭开的。这时的社会形态虽然宣布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但

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战时文化”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一下子转换过来。它对新诗“当代化”进程的影响是本质的、决定性的。在当时，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热情，被引导为社会生活的主调，它极大地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新诗很容易获得一种历史上少有的欢乐情绪。当然，将“工农兵”确定为历史主角的新中国，也要求诗以“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尤其是为政治服务，要求它在与“过去”告别的同时，跟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步伐。这一切预示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基本面貌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但新诗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似乎也证明了，诗会在当代遭遇意想不到的历史命运。对诗艺术规律的忽视，以及对它社会功能的过分强调，常常产生出负面的效应。然而，这种“现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诗内部机制和外部文化环境的极好角度。

自然，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概况的描述，需要有一个审视政治背景、经济状况和文化氛围的开阔眼光，需要辨析文艺与政治、诗人与社会风气、当代诗与外来影响、作者心态与读者伦理观念等之间的关系。还必须看到，社会在它发展的某一阶段，一定会强制新诗在“方向”、“道路”等问题上做出符合其愿望的选择，例如诗的“社会主义方向”等。但是，已经形成的中国新诗“传统”，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相反的力量，使对诗歌的重新“塑造”变得不那么顺畅。所以，以下的分析，更加侧重于社会文化环境、新诗传统和中、西方诗歌的关系等三个方面。

首先，对“生产”出当代中国诗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基本认识。1949年后，具有农民色彩的思想文化，开始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化。具体地说，“根据地”的思想意识，逐渐占据了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被全面贯彻到社会、文化、学术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在以《新的课题》为题的文章中，文艺理论家吕荧强调了作家思想“转弯”的重要性：“在这个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新的创作课题——表现人民的课题。”^① 在为新华广播电台播讲的文章里，当时已成为文艺界领导人的茅盾，也号召作家说：“为工农兵。就是说：文学和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说：诗歌、戏剧、小说、绘画、音乐等，要描写工农兵，以及工农兵的干部，要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②

^① 吕荧：《新的课题》，载《文艺报》，1949（11）。

^② 茅盾：《为工农兵》，载《文艺报》，1949（11）。

显然，上述意见不是一般文人的“清议”，而是来自政治权威层面的“声音”，代表着日益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不单确定了新诗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更是营造了新诗创作的时代性“语境”。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注意到，新诗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一系列“运动”的痕迹。1957年以前的诗歌创作，以经济建设与和平的题材为主，“颂歌”的气象虽然有所初露，但作品的格调仍然是宽松、祥和的。1957年、1958年、1959年是诗歌大批判的三年，不仅批判的对象反复变动，《诗刊》编委会成员经常被调整，而且“目标”也时常忽东忽西。例如，先是号召“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继之是批评“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接着又出现了情绪浪漫而夸张的“大跃进民歌”。1960年到1962年的诗界，开始强调重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但这一艺术的自觉和清醒，又为更加激进的诗风所淹没；在1966年到1976的10年间，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终于将诗歌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推向了极端的状态。

文化的调整、文艺思潮新的涌动，是与一个个诗人的“失势”与“消失”相联系的。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不点名地对诗人兼批评家胡风进行了指责，认为他“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者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势必会“为时代所唾弃”^①。在《诗刊》1957年7期推出“反右派斗争特辑”之后，又在同年9期点名批评了艾青等人。该文认为，“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一首晦涩难懂的坏诗”，它“只不过是艾青在搬弄早已陈腐的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的伎俩”；公刘的《杭州诗稿》、《迟开的蔷薇》等作品，“正是作者颓废和阴暗心理的反映”；诗人穆旦曾在当年《诗刊》3期发表《葬歌》，真诚地表示要“埋葬”自己的“过去”，脱胎换骨，向新的时代敞开胸怀，然而，批判者仍坚持认为这篇文章只是“一些观念和文字的游戏”，“是从现代主义的泥淖里捞起来的”^②。尽管，批判者宣称诗人们坚持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态度很难讲不真诚，但批判的结果，却极大地伤害了诗人们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它使诗人开始回避内心世界的真实，放弃对艺术独特性的追求，更使诗歌创作的个性化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并不鲜见。

其次，新诗传统对当代诗歌的影响。1949年以后诗的“当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性”。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任何一次重要的庆典，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专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

② 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载《诗刊》，1957（9）。

都会在诗人的创作中有所反映，得到鲜明而及时的艺术再现。但这种“时代的最强音”，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是不让人感到陌生的，人们不难从当时的诗作中找到先例。

在新诗发展的前30年，“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虽说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具有现实主义格调的诗潮似乎更容易与时代大众的命运相“吻合”，常常压倒了前者的声音。五四时期郭沫若“火山喷发式”的诗作，在标榜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同时，其实也包含着对社会的关切，否则，就不能理解1925年后他突然对“革命文学”的鼓吹。1926年3月2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热情地号召：“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沈泽民也响应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①这种不再独步于书斋、而直接投身于社会实践、宣称在时代的激变中把“自己的态度拿稳”的思想模式，开创了新诗实践理性的新风气，对新诗后来的文化选择影响是很大的。30年代是苏俄文艺思潮影响显著的一个时期。诗人的身份在这时的一个变化是，他不只是“诗人”，而且也是一个“革命者”。钱杏邨认为，作为革命者的作家的职责是摄取“尖端题材”，如果写反抗，必须写成完全自觉的反抗，是阶级化、组织化的反抗，要从“英雄主义的个人主义转到集体主义”^②。殷夫把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置于自己的个性之上，他的“红色诗”，是个人转向集体乃至献身集体的一个典型示例。30年代诗歌的另一特色是，诗歌创作和工农大众的实际结合。“左联”在1931年至1932年开展的讨论，突出的论题是文艺的大众化和作家如何向群众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者从血泊里重新回到上海的亭子间，手中的笔，成为他们参与现实和继续斗争的武器。这些可贵的人生经历，本应该成为艺术财富，进入诗人们新的创造视野，为时代留下感人至深、艺术上更臻成熟的诗作的。可惜任钧、蒲风等中国诗歌会诗人，由于过分强调“明白”、“浅显”，他们的诗，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含蓄和美感。40年代的“根据地”诗歌，受到“左联”时期诗歌观念、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很大影响。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根据地诗歌中得到了具体的艺术实践，但根据地的诗人不像蒲风们那样，在吸收大众口语成分的同时，又保留着“欧化”的痕迹，而是直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内容。李季曾颇有感触地指出：

① 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11-06。

② 钱杏邨：《一九三〇年一月创作评》，《文艺批评集》，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如同相信劳动人民创造世界一样地相信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才能对人民的艺术、对民歌发生爱情。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进了童话中所说的宝山一样，惊叹民歌这个艺术宝藏的丰富无比了。”^① 在新诗史上，李季和他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直是作为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成功范例来谈的，原因就在，它既塑造了王贵这样一个大革命背景下翻身农民的形象，还熟练运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和语言，农民们能“听懂”，文化人看起来也不觉得粗糙，甚至还觉得别有风味。50年代后，关于诗歌的发展道路和艺术探索始终存在争论，却没有任何一方贬低李季的民歌体创作。这说明，人们不满的只是不成功的现实主义诗作，却不怀疑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本身，诗歌的“当代性品格”不仅未受到压抑，现实主义诗风反而被发扬光大，成为新诗发展的主要潮流。

新诗中战斗的、政治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影响，也要通过一些重要的“环节”才能够实现。人们注意到，除了文艺政策的引导、规范和强制之外，一些老诗人的“说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文艺报编辑部曾组织过一次笔谈，题目是“新诗歌的一些问题”，参加者中有冯至、林庚、田间、力扬、彭燕郊、邹荻帆等老诗人。尽管大家所谈的角度不同，有的讲到“立场”，有人主要研究诗的形式，但在观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邹荻帆认为，“站不稳立场，把握不住方向”，将会对诗人创作产生不利的影响；田间认为重要的不在表现形式，而是你贴不贴近人民；冯至则说，虽说眼下存在着两种诗体，即自由体和歌谣体；然而，后者有着更大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歌谣容易被工农兵接受”，自由诗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却还是生疏的”^②。诗人们在这里触及的，是诗歌创作中的“阶级立场”和“人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对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歌观念阐释中，对上述理论的“原义”所进行的“改造”和对新的内容的“增添”。但是，在另一些老诗人，例如阿垅、李白凤等人的文章中，新诗的上述“传统”不仅保留着历史的“原貌”，而且他们对“现实主义精神”，也作出了不同于冯至的“解释”。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说明当代诗歌确立新的思想准则、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的过程，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新诗“传统”的解读和利用，往往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出现很大的差异。例如，冯至等人的观点，在80年代诗歌理论中就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① 李季：《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载《文艺报》，1949（12）。

② 冯至等：《新诗的一些问题》，载《文艺报》，1951（2）。

最后，当代诗歌与外国诗歌的关系问题。前面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产生当代诗歌的土壤。这种土壤，必然会使诗重新回应新诗史中另一条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说到底，这是因为它关联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在解放区业已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实践。50年代后，它又与如何巩固人民政权、加强它对社会生活的强大影响力的一整套文化策略联系在一起了。它产生的结果是审美理想上的民族化、民间化乃至本土化和对世界诗歌潮流（在潜意识中，是“西方”的东西）的拒斥。也就是说，五四以来主要受外国诗歌影响的传统，在解放后受到了一次重大的美学上的修正。它主要是通过几次文艺斗争和争鸣完成的。第一次是在清算胡风文艺思想背景下的对诗人兼诗论家阿垅的批评。1950年4月，陈涌发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对阿垅的诗歌观提出了公开指责。他认为，阿垅诗歌观的错误，一是提出“超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所谓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意在“歪曲”《讲话》的精神；另一是看不起民间文学，主张向外国诗学习，宣称是为了维护五四新文学的思想传统。这实际是“希望保留”“残缺不全的‘艺术王国’”，是“抵抗”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的典型表现。发表该文的《文艺报》，为此加了“编者按”，并同时推出史笃的一篇批评文章。在无形的“压力”之下，阿垅被迫做了“检讨”，他说：“编辑同志：《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① 批阿垅的实质是批胡风，而批胡风则是与文化选择上回归本土、拒斥世界文学潮流的政治策略，是和维护文艺上的政治权威紧密联系着的。另一次诗歌界的文艺思想斗争，发生在“反右”运动中。刚开始时，主要是反对“诗歌中不良的创作倾向”，批评“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技巧”。不久，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一些文艺观受外国诗歌影响较深的诗人，如艾青、穆旦、蔡其矫、唐祈、吕剑、李白凤、公刘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为1957年7月号《诗刊》写的《代卷头语里》，臧克家对前者进行了“阶级定性”，他说：“这是工人同志们的声音。这是农民同志们的声音。这是火力旺盛的青年同志们的声音……这声音，从生活的实感里发出来，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真挚热情里发出来，它钢鞭一样向右派分子、野心家呵斥，抽打，毫不容情，壮丽有如一首激动心腑的诗。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

^① 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载《文艺报》，1950（4）。